

刘春, 2000, 《民族问题文集》(续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吕思勉, 1996, 《中国民族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 影印本参见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0卷)。

马戎编, 1997,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戎, 2001, “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第141-151页。

田继周, 1996, 《先秦民族史》,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本书属于《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 该《丛书》分为《先秦民族史》、《秦汉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等8本)

王桐龄, 1934, 《中国民族史》, 文化学社(影印本参见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0卷)。

王钟翰主编, 1994, 《中国民族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译文选载】

# 民族认同<sup>1</sup>

霍洛维茨 (DONALD L. HOROWITZ)

在喜马拉雅西部的山脚下, 印度的 Himachal Pradesh 州, 有三个族群处于一种亲密的互动过程中。Chamialis 人主要集中在 Chamba 城; 正如 Frances L. Nitaberg 描述的<sup>1</sup>, 比起其他在这里相关的两群体, 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 城市化程度更高, 在印度种姓和婚姻仪式方面也更正统。他们先进的和城市化的地位反映在政府官员的雇佣中占大多数。Chamba 东部居住着 Brahmauris 人、牧民和季节性移民, 他们和 Chamialis 人交往甚密。Bramhmauris 人处于压抑的状态。他们的土地人口密集, 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少, 而那些可用土地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许多 Bramhmauris 人已经习惯到 Chamba 城就业。但是, 在 Bramhmauri 社区, 在城里工作产生的影响就不同了。Bramhmauri 的婆罗门人 (Bramhman) 要比 Bramhmauri 的 Gaddis 人在城里就业的人多, Gaddis 人事实上是由几个种姓等级地位较高的次群体组成的混合体。结果尽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他们逐渐成为受压抑的群体。“Gaddis 人”这个词在 Chamba 城变成了受贬抑的词, Gaddis 人似乎越来越转向较低等级的身份认同中。

同时, Bramhmauri 的婆罗门人 (Bramhmans) 以前和 Gaddis 处于事实上的平等关系, 现在开始切断和他们受贬抑的堂兄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愿意和 Gaddis 人一块吃饭, 并且开始采用传统的作法, 如不吃肉不喝硬饮料, 以使自己和 Gaddis 人区别开来, 并与城市里的 Chamialis 人认同。Bramhmans 人依靠 Chamba 城, 一方面导致他们逐步同化, 另一方面, 导致他们与 Gaddis 人日益分化, 这加剧了以前在某种意义上曾经减少过的 Gaddis 人的内部分裂。

如果这些是比较严重的依赖的结果, 那么比较缓和的依赖看来对第三方族群 Churahi 人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这个族群大部分都居住在 Chamba 城北部的山区过着宁静的生活。Churahi 人遭受的人口压力较小, 只是最近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收成不好, 还有其他经济问题, 并且与

1. 本文译自 N. Glazer and D. P. Moynihan 主编的《Ethnici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第111-140页。



Chamba 人有了更多接触。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加强族群的身份认同，降低 Churahi 人内部分化的重要性。种姓通婚，甚至高等级和低等级种姓之间的通婚，也偶尔发生并被容忍。对于 Churahi 人，依赖并不是像它对于 Bramhmauris 人那样，是群体解体和与外部模范群体竞争的刺激因素，相反，它产生了更大的凝聚力和种族中心主义。

在 Chamba 城这里所出现的族群边界转变的程度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群体身份在现在和过去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例如，Gaddis 人是由以前依稀可辨的、相互分立的群体组成的混合体。而且，现在的边界运动至少趋向于五种不同的发展方向。Bramhmauris 人正在失去内在的团结而分裂为它的各组成部分。其中一些群体正在接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模式，即 Chamialis 人的身份。而其中别的群体，如 Gaddis 人进一步分化为古代的次群体。同时，倘若 Bramhmauri 的婆罗门人（Bramhmans）使他们的习俗更正统，Chamialis 人会扩大他们的边界以吸收 Bramhmans。对于 Churahi 人，他们坚决拒绝让依赖减弱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反而通过减少内部分裂来巩固他们的边界。

那么，这是一个复杂的事，它仅发生在北印度一个州里的一个地区的七个群体中的三个群体里。这个例子是狭隘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群体边界是经常变动的<sup>2</sup>。然而，大多数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更趋向于把群体当作既定的，好象他们自从太古时代就是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的。

我不是说群体边界的变动性是什么新的“发现”：不是的。关键正在于边界变化的程度与重要性普遍被贬低了。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经院意义上的问题。例如，人们怎样评估那些针对民族冲突提出的同化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办法隐含在一度非常时髦的词“建立民族国家”里）的前景，这种解决方案没有系统理解在何种情况下群体会消除他们之间的界限。

我也不打算在这篇短文中纠正这个问题。我要做的仅在于确认一些边界变化的方向，确认一些看来能影响那些方向的力量和其他可能伴随边界变化而产生的运动。

### 族群变动的种种

族群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多少是排他的。“族群中的成员身份是一个社会定义的问题，是成员自我定义和他群体定义的互动”<sup>3</sup>。大多数群体边界都缓慢而静悄悄地改变，但有一些改变是迅速的、特意的和明显的。当然，原因在于把民族和自愿归属区分开的关键特征。民族身份一般是在出生时获得的。但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首先，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有可能改变个人的身份。在某些情况下，语言的或宗教的转变足可以造成个人身份的改变，但在其他情况下，身份的改变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通婚和繁衍才会实现。第二，集体行动，意味着群体行为和身份认同的有意识的改变，可能会影响边界的转换，就像在 Chamba 城中的事例。因此，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公认的共同的原因，而不是绝对的。对大多数群体而言，出生原则有虚构也有例外。这样，民族不同于自愿归属，不是因为二者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不同位置上。

有这么多与民族的变化相关的过程，以至于确切详细地说明还存在疑问的现象变得非常重要，以把他们和其他的现象区别开来。这里我们着重关注族群边界的变化，这种改变不是个人的，而是共同身份的改变。一个群体在成员身份判别标准方面可能变的或多或少是先赋的，可能或多或少被涵化而去遵循他群体的规范，或多或少存在内在的凝聚力，也可能多少变的种族中心的或敌视其他群体。虽然所有这些可能的变化都可以产生群体边界<sup>4</sup>的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



的事<sup>5</sup>。

人们常常把边界扩张与收缩和先赋的等级社会里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变相混淆。在印度，社会地位通常和族群边界一块改变并被混淆。一个种姓等级里的一部分人可能发现他们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么为了提高他们共同的地位，开始中断与其他成员的关系，这样原本是一个群体便产生出两个群体。<sup>6</sup>和分裂一样，联合也会在种姓等级体系中发生。一些以前分裂的等级会合并，这个新的单位通常通过摒弃掉内部等级的特点而寻求向上的流动性<sup>7</sup>。事实上，集体流动通常是合并的一个动因，以期一个更大的单位会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更高的仪式上和社会上的地位<sup>8</sup>。有时当边界改变与有意的阶级改变相联系时，这里注意，这两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对另一个都不是必需的，这很重要。

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群体边界可能变宽也可能变窄。一些群体身份可能由于同化(assimilation)而消失，这是一个消除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间界限的过程。有两种主要的同化。两个或更多的群体可能联合而形成一个新的不同于其组成群体的新群体。我们把这叫做混合(amalgamation)。在 Chamba, Bramhmauris 人和他们的次群体--Gaddis 人，都是源于这样的过程而组成的混合体。另外，一个群体可能会通过合并到另一个保留自我身份的群体里而失去他们的身份。我们称为包含(incorporation)。在 Chamba 的 Bramhmauri 人中的婆罗门人(Bramhmans)显然是处在以这样的方式被 Chamialis 人吸收的过程中。

“分化(differentiation)”就是由于出现另外的群体而使边界变窄。一个群体可能分裂为它的组成群体。显然，这是“分裂(division)”。在 Chamba, Bramhmauris 人正分裂为它的组成群体，其中的 Gaddis 人又进一步分裂为更小的组成群体。另一方面，存在衍生(proliferation)的可能性：即一个新的群体产生，而产生这个群体的“父母群体”(或群体)不会失去它的(他们的)原有身份。在 Chamba 中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这种现象到处可见。在特定的西印度的奴隶制社会，“白人”和“黑人”(他们自己本身是混合体)通过繁衍产生了分立的“黑白混血”或“棕色”群体。<sup>9</sup>在同时代的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据说正在出现一个叫“穆斯林”的族群<sup>10</sup>。那些现在开始被叫做穆斯林的以前被认定为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或某种联合体)。但是，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是正统的基督徒，大部分克罗地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重点要强调的是这些宗教归属作为定义族群身份的特点，已经开始在那些并不拥有相同的宗教特征的群体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身份<sup>11</sup>。这些可能的边界变化如下表归纳：

表 1. 民族融合与裂变的过程

同 化		分 化	
混合 A+B-C	包含 A+B-A	分裂 A-B+C	衍生 A-A+B (A+B-A+B+C)
两个或以上群体联合形成一个新的群体	一个群体承认了另一群体的身份	一个群体分裂为两个或更多个组成它的部分	一个或更多群体(通常是两个)在原有等级中产生出另外一个群体

尽管族群身份有多种多样变化的可能，一些群体看来还是能多少完整保留传统身份很长时间。索马里的 Samaale 人和 Sab 人历史上就存在相互反感和宗族分裂，看来似乎是典型的早期群体<sup>12</sup>。斯里兰卡(锡兰)的 Sinhalese 王国包含了各种社会地位的次群体，并经常吸收来自印度的新移民，如 Salagama 人<sup>13</sup>。结果是一个以 Sinhalese 人为中心的身份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象这样完全长寿的族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保持包容性。一些有长达几个世纪合并的历史的群体



现在不再是从前那样高度开放和具有包容力的实体了。赞比亚的 Tongo 人和乌干达的 Baganda 人依照习俗会欢迎和合并相当规模的陌生的他族人，现在至少不再会在相同的程度上这样了<sup>14</sup>。群体身份是传统的，但在边界的牢固性上以及成员身份仅由血统获得的程度上会有细微的变化。

其他群体只不过是全新的。直到差不多最近，锡克人都很难被称为一个身份完全明确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印度家族的子孙。锡克教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是在 Punjab 地区对抗穆斯林统治的军事与宗教力量。<sup>15</sup>用表中所列术语，锡克人就是“衍生”的结果。同样地，基库尤人(Kikuyu)在肯尼亚的前殖民统治时期没有真正的群体凝聚，强烈的次群体忠诚还很重要。<sup>16</sup>基库尤人(Kikuyu)是一个混合体。许多其他在非洲和亚洲的族群也被称为是“虚假的”，因为就在 50 或 100 年以前，他们还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共同的意识。其中有些群体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当代政治中显然是最具有同一性和凝聚力的因素——这样的群体如尼日利亚的 Ibo 人和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看来使用经常被借用的词“原生的”来描述象这样最近发生融合与分裂的群体，或者那些比起以前变得越来越先赋的群体，是不恰当的。<sup>17</sup>

我谈到这些扩展与收缩群体身份的过程好象一个人只能每次拥有一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一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以前的身份处在转向新的身份而被逐渐抛弃的缓慢过程中，因此，常常不止有一个身份。即使没有这样的转变情况，拥有多重先赋的身份也是常事，特别是当几个身份处在几个不同的普遍的层面上。一个人可能出于某种目的认同自己是一个小的亲族群体或宗族的成员，也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民族集合体的或“国籍”或“种族”的成员。<sup>18</sup>

先赋的身份非常依赖于所处情境。它包含了多重等级或层面，随环境而改变。一名在法国的非洲留学生会以一种方式认同自己；在他的家乡又会是另一种方式。<sup>19</sup>在某种情境下，一个黎巴嫩人会满足于自己的宗派归属（例如，马龙教徒或东正教徒，逊尼派或什叶派）；在其他情境下，他可能被促使认为自己广义上是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sup>20</sup>尽管先赋身份存在多重性，但所有层次并不会保持同样重要，如果只是因为所有情境并不都是同样重要。

那么，什么决定哪个是最重要的成员身份呢？或说的精确些，这么多可能的身份哪一个会最经常被使用与激发呢？看来几乎关于民族认同的“重心”的长期转换都和持久的某一外在刺激相关（我们可以简单考虑是什么种类的刺激因素）。因为刺激在某一层次上留存并比在其他层次上更重要，一个人可能开始认为自己首先是 Ibo 人但也是一个 Onitsha Ibo 人，还是一个尼日利亚人，或者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泰米尔人，也是一个 Vellala 种姓等级的一员，还是一个锡兰人。这样就有“溢出效应”的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一种身份可能会变得独立于或“功能自治”于产生这种身份的刺激因素，并且这种身份可能会变得内在化以至于甚至情境已不同于产生它时的情境时仍会被援引。<sup>21</sup>这些溢出效应或功能自治对身份会随情境改变而改变的普遍假设构成了一个限制。民族身份认同是经由学习过程形成的这一事实遏制了它改变的速度。

在考虑边界变化的动力学问题之前还要做一个区分。这个区分就是身份的判断“标准”和身份操作性“标记”之间的区分，基于前者可作出集体的相似性与不似性的判断，基于后者个人成员身份得以判断。如果在美国，一个具有极少非洲祖先血统的人被定义为一名“黑人”，就是属于成员身份的“标准”。“标记”当然是肤色、面貌等等——没有一个甚至所有这些标准能够在世系标准问题上具有决定性。同样，在北爱尔兰，群体成员身份是建立在爱尔兰人（和天主教）相对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和新教）起源上的。然而，在许多例子中，姓氏也常被用作成员身份的标记，这对于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可靠的。<sup>22</sup>



这种区分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难以捉摸的。标记是身份的证据，不象标准，标记不定义身份。标记是方便的，在标准得以采纳而后发展起来（不管这种标准是多么的不言自明）。作为替代物，身份标记有或然性并易被反驳，正如制服的穿戴或一个组织的象征可能由于和官方领导人员有关而被反驳。<sup>23</sup> 两者间的混淆部分是因为一个标记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它逐渐被当作标准来使用，在波斯尼亚新的“穆斯林”身份的出现可以作为例证。

那么，当拥有新的身份时，个人成员身份的判断一般都基于那些有较大可信性的辨别力的象征作出的，这种可信性的程度随成员身份重要性及这个象征在多大程度上是先赋的而有所变化。族群间边界越不重要，标记越不重要，那么依据它判断成员身份就越易出现虚假或错误。<sup>24</sup>

身份因此趋向结晶化或如 Gordon Allport 所说，象征或暗示的“浓缩”。Allport 指出这种暗示通常是可见的。<sup>25</sup> 的确，经常如此，因为可见的暗示有相当的可信性和相对不变性，特别是当他们是身体特征时。然而暗示或标记并不需要是可见的。如果区别特别大，不管这些暗示是否是可见的，<sup>26</sup> “都能在寻找辨认身份的暗示时被增加和富有效率”。此外，那些被用来把一个群体和别的群体区分开来的象征在身份的不同层次上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特征。一个主要的身份可以由语言来表明，而一个不是很重要的身份可能由行动特征为表征，一个更不重要的身份可以由视觉特征来表征。<sup>27</sup> 最后，不用说，根据构成身份标准的基础的形态与意义，在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身份象征可能在另一个社会里被忽略或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

### 身份，扩张与收缩

在怎样精确的基础上，以前并不相关的群体会变的认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而排除其他群体呢？这仍是一个基本上未作研究的问题。完全地讲，我们可能知道身份的标记趋向于遵从身份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又是遵从什么呢？

一般来说，两类变量似乎在塑造和改变群体边界上有最重要的影响力。第一类是和那些被认为拥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与差异的它族人的接触。第二类是群体借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政治单位的大小及重要性。

当然，这两类变量是相关联的。政治边界趋向于把维度放置在群体发生交往的地方。反过来，这种交往致使群体有必要筛选出他们的相似与不同。

不可能真正准确地描述这个筛选过程就好像选择朋友或联盟那样的“选择”，<sup>28</sup> 因为这个过程最终结果是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一些群体由于归因于共同的祖先而相同了。这不是要完全排除工具性或策略性的考虑，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都深深陷于感性的判断之中，这个判断是在一个特定情境里遭遇的某些群体（但不是其他群体）在一个系列范围内的相关性的判断。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暗示，所涉及的是关于社会认知以及特定的同化与对比效果现象的一般研究的方面。<sup>29</sup> 和在物理的判断一样，在社会性事物的判断上，判断的刻度趋向于发展，刺激物被放置在刻度位置与已在序列里的刻度相关的位置上。例如，如果一个物体呈现出一系列的重量，有人开始给这些重量分配彼此相关的分数。最终的数值系列作为“锚”起作用。也就是说，它们会比以这个刻度标出的其他的数值对于判断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刺激越接近这些锚，判断越趋向于精确化（这里数值客观上趋向于可被证实），并且，判断越趋向不会变化。判断上的转换是和刺激在范围内的变化（这是说，锚在位置上的变化）相联系的，同时也和刺激的频率分布的变化（这是说，刺激的中值的变化）相联系。当一个锚和一系列刺激之间的区别很大时，对比效应



就可被观察得到。区别会趋向于被夸大而远超过事实上的差异范围，产生了明显的对比。然而，当在这个系列中的一些项目开始接近这个锚的位置时，同化效应就可被观察到：区别开始最小化到低于实际差异的程度，产生合并。

这些现象与新的身份出现的相关性看来是十分清楚的。这里，刻度是和群体的相似性和不似性，而不是和重量或大小相关的。最终的分数或锚与群体被表现的范围相关；这些群体在特定情境下构成一系列；判断性的问题是特定群体将被放在刻度上的哪里。不仅是范围而且是频率分布——也就是说，在系列中不同程度上被代表的特定群体的数量——会影响评价放置过程。同化和对比效应很可能发生。那些处在带有有限范围差别的狭隘的环境中看来是主要的性格或行为上的偏离，当范围扩大时可能看来很微不足道。在一个环境中分裂甚至相互敌视的群体，可能会在一个新的成分更混杂的环境中被认同或认同自身都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内在的机制在于普遍的认知趋势是简化细微差异，忽略小的区分，而当这些区别呈现难以控制的复杂性时，夸大较大的区别。简言之，同化与分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可能只是同化和对比效应的特例。

如果这是一个身份转变的一般过程的模型，仍然会有主要的基本问题没有回答。关于判断刻度的研究总是会随着预先详细描述的刺激物的性质（重量、大小等等）而进行，但是在边界变化问题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是相似性与不似性的区分标准？另外，社会判断很受内在化参考刻度的影响，这些刻度都是习得而很早发展起来的。什么样的共同经验很可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身份判断产生影响呢？这在我看来是研究考察的两个主要问题。<sup>30</sup>

尽管有这些关键问题上的疏忽，某些作为身份改变基础的线索可由社会判断理论提出。首先，判断趋向于转到那些在系列中有回报的价值上。<sup>31</sup>在这个基础上，假定稍更有些威望的族群在合并中会扮演更具强大吸引力的角色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像 Baganda 人就是有威望的群体的一个例子。而且，在一个意义含糊的系列里，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人的判断变得特别有影响力；刺激物越模糊，实验主体越易受周围别人观点的影响。<sup>32</sup>这证实了在边界变化上自我定义和他人定义的相互作用，并把注意力投向这个他人是谁的问题上。最后，抛出这样的问题，转换的刻度、系列和锚这些相对论的字眼种下了疑问的种子，即从文化满意或同型性的角度看待族群边界的传统的形成。文化的变化可能会跟随或伴随，而不是先于身份的改变。如果是这样，一个特定文化组合作为身份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意义很可能被大大过分强调了。<sup>33</sup>

同化可以因此不总是像以前经常提到的那样，依赖于先前的涵化。文化改变与身份改变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序列（次序）可能依赖于所涉及的同化的类型。因为常有断言称，用来界定族群的特征之一是有特色的文化，这一点是值得详细说明的。

关于文化顺从，在包含和混合之间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区别。为了“适用于”包含，被合并的群体（相当于表上第二栏的 B 组），很可能需要通过事先改进他们的行为以表明他们正在日益接受并呈现出包含群体成员的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在 Chamba 中 Brahmauri Brahmans 人事实上所做的。因为至少某种程度的涵化可能是包含过程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这并不对混合也同样适用。一种新的身份对于所有其组成群体都是新出现的，没有一个次群体会处于合并的群体那样的位置而可以把其特色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强加给别的群体。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随着一些被合并进的次群体在更近距离的范围内显现他们，而这些特点在其他次群体可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和需要改变的，那么这个包容的、逐渐出现的身份可能由于重大的文化分歧继而受到威胁。为了防止新的身份认同被破坏，向心的力量开始引导文化变异走向基本的和谐。



这不是说差异不能被容忍。有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去认为混合体少有力量去强迫各组成部分像合并的群体那样的同质。看来所出现的是“最小公倍数”式的混合体的文化。最大的分歧被慢慢传开，那些可能或者不太可能突出地与特定的次群体相关联的，某种形式上的特点看来也变得突出了。这样，在毛里求斯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最能“证明”这一点：“当地的和宗派的习俗”已被抛弃而“赞成一个统一的正统的习俗”。<sup>34</sup>——这恰恰是宗派分立的次群体混合后的结果。同样地，从东孟加拉的 Noakhali 地区来的穆斯林通常被认为是特别虔诚的，肯定比其他东孟加拉地区的人更虔诚。在 Noakhali 人中布道者的宗教习俗和价值观支持了这样的观念。但是从 Noakhali 来的经过城市化的工厂工人却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宗教倾向。Howard Schuman 得出结论说，从 Noakhali 来的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可能比那些留在本地的人要少一些虔诚，但是他也暗示说“他们一度在城里，会回应那些更鼓励娱乐的价值规范。作为在信仰方面‘离经叛道’的群体，Noakhali 人更可能在城市工作环境中改变，在那里超越民族的价值规范传播开来。”<sup>35</sup>

其他重大的偏离也很可能被最小化。在西部马来西亚 Negri Sembilan 的马来人，一般是 Minangkabau 次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并非是个典型马来人群体原因在于它实施的母系制。其他马来人把这视作“对‘正常的’马来亚生活模式的古怪的偏离”。M.G.Swift 猜测，在互动过程中，“Negri Sembilan 的马来人趋向适应社会大多数人的文化标准”<sup>36</sup>。在尼日利亚也是如此，据观察：

例如，约鲁巴人，出现了一个标准口音，穷人富人穿衣样式有了一种相似性，这在一个世纪左右以前还不存在。事实上，最近他们才有了作为约鲁巴人的意识，约鲁巴这个字眼以前只适用于 Oyo 王国。<sup>37</sup>

这样看来在混合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消除次群体间行为隔阂是一个普遍的趋势。<sup>38</sup>

在混合过程中，和在包含过程中一样，文化改变得以促进。但对于前者，很可能比所要求的更缺少一致的规范，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被这样要求——不是作为身份改变的前提条件，而是作为身份改变的结果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得把目光投向文化相似的观念在边界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上来。群体文化（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方面肯定会富有争议，但是一旦作出关于共同点与不同点的判断，文化调整必然会适应新的边界而受到影响。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的看看，族群边界改变在“系列”中改变的影响以及群体身份自我定义和他人定义的互动产生的影响。如果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系列越宽，其中的群体边界也就越宽。非洲学生经常引起人们去关注，在扩大族群身份过程中移民和城市化的重要性问题。以前小的、截然分开的族群成为一个更大的聚合体——有时被叫做“超部落”，这个过程已经被很好的记录下来。<sup>39</sup>这些新的身份识别随着乡村—城市移民第一次在城里和其他陌生群体的互动而发展，显露出他们在家乡并不明显的共同特性，然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乡村地区后，会普遍化这些新显露出来的共同特性，把乡村群体成员引向和它群体的“设身处地的交往”<sup>40</sup>中，并且通常会通过建设包含整个群体的政治组织来加强这个新的身份认同。

城市对大多数非洲的群体扩张构成严峻的考验，不意味着特别是城市化交往对于群体边界的扩张是必需的。成分混杂的城市环境只是扩展了族群的系列，推进某些群体间的区别模糊化，并使他们和其他群体的区别明显化。这样，在乡村或地区广大的环境中也能看到相似的结果。作为展示，这里引用三个例子——一个非洲的，一个亚洲的和一個加勒比的。

第一个是在 Zanzibar（桑给巴尔岛）上的“Shirazi 人”群体界限的扩展。<sup>41</sup>Shirazi 人以前是



由那些自称是非裔波斯人祖先的后代的 Zanzibaris 人组成的，因此在 Zanzibaris 人中包括在 Zanzibar（桑给巴尔岛）上的非洲居民。然而随着大批非洲大陆居民的进入，他们的群体定义有了扩展。随着和非洲大陆人的对比变得明显，Shirazi 人渐渐在 Zanzibar（桑给巴尔岛）上适用于所有“本土的（也就是长期居住者）”非洲人，不管他们是否自称是波斯人的后裔。Shirazi 人和非洲大陆人已有的分裂有相当大的政治意味，例如，在 1964 年议会政府以前的党派政治中有所表现。

第二个例子来自马来亚（现在是西马来西亚）。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干涉马来亚期间，“马来”人口非常多元，所包含群体来自远如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岛、婆罗洲和爪哇，也有一些阿拉伯人。这些群体倾向于说不同的语言，族内结婚，经常互相敌视并使用暴力。<sup>42</sup> 在这种情况下到达的中国人，特别是大部分在 19 世纪大规模锡矿开采兴起时到来，他们由于来源地的不同而内部分裂。所谓的方言差异界定了中国人间明显的和两败俱伤的界限。<sup>43</sup> 然而，在几十年内，一一可以肯定到了二战结束后一一出于大多数目的考虑，强大统一的马来人和中国人身份取代了这些较次要层次的忠诚<sup>44</sup>。由于这些群体的并置遍布马来半岛大部分，上述的进展得以促进。

第三个非城市化群体的融合的例证涉及到，在前英属殖民地圭亚那（现在的 Guyana）和千里达岛的非洲奴隶，和以后签定合同的东印度劳工的失效的身份演变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个广泛的族群系列的人代表非洲人被运往新世界。尽管持续两个世纪的来自非洲的灌输，和白人种植园主的暗示，这些白人认为非洲人内部的敌意可以阻止共谋叛乱而对白人的安全有利<sup>45</sup>，但这些具有难以克服的多样性的群体还是均质化为单一的身份。首要地，归因于践踏了劳工对于财产的要求，这使得永久保留源自非洲的族群差异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经历了种植园中可怕的暴行，使得奴隶不可避免要接受主人对民族的定义。

一个相似的虽然不完全相似的融合发生在东印度人之中，他们在 1834 年奴隶解放以后被引入以在庄园干活。对于白人种植园主，最有意义的群体区分是在于谁对蔗糖经济重要与谁不重要之间的区分。个人的品质被当地白人认为是和在庄园劳动中（以非常低的薪水）有效率的工作表现相关，而这都被归于印度人这一群体。相反的特点就被归于以前非裔的奴隶。尽管在印度移民中宗教、语言和种姓等级成分混杂，但印度人被当作好象是由基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实体组成的群体来对待，并不被承认有明显的先赋的区别<sup>46</sup>。这是最适应管理一个相对不分化的劳工大军的需要的处理方法。殖民政策和刻板印象因此有助于加强印度人的身份认同以对抗相互竞争的亚群体身份，也有助于和黑人或克里奥尔人的身份划出清楚的界限。

甚至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裂在这个过程中都丧失了很大的意义。在海外的其他印度社区，印度的分裂立即把那里的移民分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东部非洲，整个群体都被中立性地重新命名为“亚洲人”社区<sup>47</sup>。相较而言，Guyanese 和 Trinidadian 印度人开始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作对克里奥尔宗教、基督教的适宜的替代选择，所以仅当作“作为印度人的可选择的方式”<sup>48</sup>。其他地区这样的分裂部分地是因为那些印度社区与印度更亲密而持续的交往的结果。但是大体而言，在圭亚那和千里达岛相对未分裂的印度人身份可以被归因于充满暴力和紧张西印度种植园经历的那种消除了的影响。

马来亚和西印度的混合的例子说明，不仅仅是新的群体并置在产生新群体的过程中发生作用，而且第三方在界定正在出现的情境中对于相似与不同的判断也会发生作用。关于这两者，英国人都在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来说，这是群体边界的殖民观念的推行。更粗陋的刻板印象甚至在相对较晚的马来亚殖民主义下被用于作决定。让印度人和克





里奥尔人（他们也已经移民马来亚）感觉到他们对铁路、邮政和电话局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次要的职位要求智识和在股票方面的金融才能，这最好由中国人来担当”<sup>49</sup>。据说马来西亚人“无疑是反对稳定而连续的工作的”<sup>50</sup>；因此就鼓励移民去工作。通过在预想的方向上导入激励与聘用制度，殖民政策在群体自我认知方面给正在出现的群体的存在提供了比以往其他可能有的认识更坚固的基础。结果是使每个群体逐渐增强了这样的意识，即想象上共同拥有的天资与缺陷、美德与邪恶的意识。

当然，如果这在马来亚适用，那么许多时候更适用于西印度群岛。尽管在圭亚那和千里达岛，非洲人和印度人群体之间最初的不同，可能要比他们在马来亚的不同更大，但是在前者却产生了比后者更彻底的融合。而当马来人和中国人依然为他们不彻底的混合找证据时，Caribbean 克里奥尔人和印度人都各自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因为这样的结果，必须采用西印度群岛的更深入彻底的和更暴掠的殖民主义。欧洲人的观点和他们毫不费力就能对 Caribbean 群体发生影响的能力肯定是使该群体产生更大同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就很好地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同样的事件和社会判断理论相吻合。就刚果而言，Craeford Young 详细记录了殖民者中的比利时传教士、军官和殖民统治者在建设 Bangla 和 Mongo 社区时的重要作用，而这个社区是在以前缺乏共同意识的被殖民的人民中建立起来的。<sup>51</sup> 我前文就指出，在模糊的刺激判断中，他人的观点尤其具有影响力。另有实验表明他人的影响力随他们的声望而变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越高，所呈现的判断尺度就越少变异。<sup>52</sup>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肯定会预期到民族上被区分出的上级（在这些例子中是指殖民者）会对群体边界的界定施加难以克服的影响。社会系统等级划分越严格，地位越高的人就越有影响力。<sup>53</sup>

关于改变群体边界的认识还有两点需要在这里指出。第一个与自我和他人定义的互动有关；第二个涉及到溢出效应。

在产生一个新的身份的同时，自我定义和他人定义不必要以相同的速度作调整。特别是如果新的身份比旧的身份更广，他人定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先于（也就是说会广于）自我定义。内化的参考尺度的存在通常意味着在一个新的情境下，一个正在出现的群体可能依然在心理上与较狭隘的情境中旧的群体身份相联系。然而，如果以前他群体和正在出现的群体接触较少，那么，他们的判断就会更少受到对旧情境认识的妨碍，由此，他们会更顺畅地模糊次群体间的界限而认为他们是一体的。

因此，经常发生的是，会有一个在身份认同上的标签。其他群体首先把新出现的群体看得比群体自身认为的更为同质。并不缺乏这样的事例。“因此，登上象牙海岸的 the Fon ,Sav 和 Popo 人没有被象牙海岸上的人所区别开来，而是将他们一起同样看作 Dahomeyans（达荷美人）并这样对待他们。同样地，Mossi 人及与他们有关的但又有区分的来自北方的群体，如 Busani 人和 Gurunsi 人通常被 Ghanaians 人一块当作 ‘Moshi’ 人。”<sup>54</sup> 东部孟加拉的“Biharis 人”绝不是都来自于 Bihar（指地名）；他们是来自北部印度几个州的穆斯林移民，孟加拉人压制他们的共同身份。<sup>55</sup> 同样的趋势在爪哇的 Bandung（指地名）Batak 人中也能被看到。<sup>56</sup> 在苏门答腊的家乡，穆斯林的 Mandailing（万隆）Batak 人把他们自己和基督教的 Toba Batak 人区分开。然而在 Bandung, Sundanese 人没有观察到他们的区别，把两者都合并到 Batak 人的类别里。这导致 Mandailing 人去重新强调是什么让他们不同于 Toba 人，但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在新的情境下这个更广的身份有一定效力或至少是有用的；偶尔，他们也开始使用这个身份了。

然而，一旦自我定义“赶上来”，同样的内化的尺度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新的身份甚至可能



会在情境和边界得以重塑的新情境不完全相同时也会被援引。而早期习得的身份产生的效应会阻止身份改变，现在它的效果就是要加速和完成这种改变。例如，在马来亚，由于马来人的身份取代了组成它的各次群体的身份，甚至在他们和中国人交往的地区也被采用，而在这些地区马来人身份的重要性相对而言较低。

### 政治边界和身份改变

地区界限界定群体交往在其中发生的“社会空间”。从社会判断理论的角度看，它们趋向于把民族系列的范围放置在群体被“放置”的范围内。它们的扩展或变窄可能暗示这是某种扩大或收缩的身份认同的报偿。<sup>57</sup>

伊博人的例子强调了正式的政治边界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楚的把新的层次的身份融合到旧身份上的事例，看来每个身份随着情境的要求都会被援引。伊博人作为伊博人时，在尼日利亚政治的国家层面上发挥着相当的凝聚力，但在较低层面上他们却接着由发源地、世系等的不同所决定的界限而分裂。在尼日利亚的前东部地区，殖民行政单位产生了一些新的身份，这些身份随着这些地区的移民在 Port Harcourt（一个伊博人占多数的城市）的城市环境中的遭遇，而逐渐变得适用起来。在这个被收缩的情境中，伊博人参照来源地确认自己的身份——这个来源地是由殖民强加“在行政分治和省之间的中间社区，”应该强调的是，尽管这些单位“首先是由于殖民地边界的专制安排，只是其次才由于文化差异”而彼此区隔<sup>58</sup>

来自孟加拉共和国的东孟加拉地区的调查数据，同样显示了强大的地区层次上的忠诚。当被问及到命名他们的“国家”时，样本中三分之二的东孟加拉人都以他们所在的地区来命名。<sup>59</sup>在赞比亚南部的汤加人中，当地大体基于亲族关系的身份认同，逐渐让位给统一的汤加人身份。然而“汤加人身份（Tongahood）的新含义有时会和由政府建立的三个政治区划的存在而发生冲突：高原汤加人、山谷汤加人和 Toka Leya 人，他们视彼此为有威胁的异邦人。”<sup>60</sup>在东马来西亚的 Sarawak（沙劳越），人口中占大多数的 Ibans 人基于“选区”间的竞争存在着重大分歧。在独立时代初期，一个人的党派忠诚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是一个第二选区的 Ibans 人，还是第三选区的 Ibans 人；有时这种竞争是疯狂的。这五个行政区是由殖民政府强加的行政单位。<sup>61</sup>在扎伊尔的金沙萨（然后是刚果的 Leopoldville），前独立时代一些主要的民族组织都是在乡村行政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up>62</sup>

尽管这些地区界限的划定是“任意的”“人为的”，但他们为群体身份构造了内在的锚。对于民族认同殖民行政单位并不是一个太过表面化的基础。在解释他的关于东孟加拉的调查数据中，Howard Schuman 评论到，对于一个外部的观察者，地区似乎仅仅是行政单位，但对孟加拉人他们也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区域，一个人倾向于从他“所属的”地区（意思是从他来源的地区）的角度来认同并被认同……从一个理论的观点看，地区在“民族性（peoplehood）”一般意义上能有效地被看作“族群”，在本质上（虽然很少被明显而深入的界定）类似于西方的国民身份群体和非洲所谓的部落群体。<sup>63</sup>尼日利亚内战前后，<sup>64</sup>类似的存在于伊博人间的那种狭隘的对抗所具有的顽固性印证了同样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群体身份的扩张，而伴随着它的是新的更高层次的身份附加于旧的较低层面的身份上。当然，殖民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同更早期的欧洲一样，群体交往和殖民地扩张的边界主要推动的就是造成更大的族群，许多这些族群甚至在殖民（以后是民族国家的）



政治层面上也能起到相当程度的凝聚作用，这是非常合乎事实的。但是，正如我已经暗示的，更具包容性的身份并不总是完全取代更少包容性的身份，或者致使后者退化，这也是符合事实的。随着情境的层面增多，通常会身份层面的增加，一些较低层面的身份一般仍会强有力的存在着。

65

虽然一般的推动方向是向上的，但对于任何既定的国家而言，那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独一的趋势。在后殖民时代的亚洲和非洲，一些最有意义的民族间的互动也和二战后的西方世界一样，在群体身份问题上涉及到向下的转换。甚至在殖民时期，一些群体也会把自己和那些早先曾被他们认作是同一群体成员的其他群体区别开来，而以前是被他们认做共同的群体成员。例如，在 19 世纪的印度，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之一就是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边界划分<sup>66</sup>。一个副作用是把锡克人从印度教徒中分化出来。印度教的 Arya Samaj 的改良主义和锡克教徒自己的运动，即 the Singh Sabha，在内容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 the Arya Samaj 强调一个被复兴的印度教文化的语言，即印地语。而锡克教徒则依恋 Punjabi 语。渐渐地，锡克教徒的运动寻求通过排除印度教的影响以“净化”锡克教义，因此引起了一种独特的锡克教徒身份的意识<sup>67</sup>。应该说，和通婚以及信仰转变一样，在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这是继面临几个世纪以来礼仪和社会的互动后的一个发展。简言之，早期的边界大大改变了，现在第一次一个先赋的锡克教徒身份出现了。

和向上调整一样，群体也能乐意做向下的调整，这表明变化的情境无疑也能像对融合一样对裂变起作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如此，如果群体在其中运转的情境中看起来缩小了，那么由于较低层面或“次群体”层面的身份具有可用性，这会为群体提供了能够得以修复其凝聚力的方便的和早已存在的基础。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刚刚按照人们通常认为的严格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边界被分隔开，Mohammed Ali Jinnah 就在 1948 年讽刺意味地发现有必要警告人们不要在未分裂的巴基斯坦做那些“地方主义的诅咒”，此人曾经在未分裂的印度对促进亚国家身份作了大量工作<sup>68</sup>。

实际上，回顾起来，独立时期全世界有 20 个或更多国家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中心问题上呈现出显著的向下转换的模式，巴基斯坦的例子是典型的代表。有时据说殖民政权“控制了”、“压制了”或“减弱了”民族仇恨——尽管也有断言称，殖民政权是“利用”民族差别来“分而治之”。尽管很难两者都行得通，但这里没有必要在这些对照鲜明的解释面前停步不前。因为理论上更有趣的地方是当殖民统治接近结束时，民族冲突突然出现增长，这反映了当地情境重要性的逐渐增长。<sup>69</sup>当殖民统治持续时，殖民范围的单位是一种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身份认同层面。一个人可能是伊博人，但是就欧洲人而言，他又是一个尼日利亚人，结果，两种身份在不同环境中都很重要。国家主义运动，试图通过强调由于施加殖民统治使当地所有族群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共同处境来加强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而这些国家主义运动并不总是相应按比例地包含所有族群。只要外界情境还保留它的重要性，那么身份的两个层面就都是显著的。当殖民政权撤退时，外部情境大大失去了它的意义，这种在身份层面上的双重性也就降低了。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富有戏剧性，这可以在首批几个得到独立的亚非国家所公开发生的事件中被观察到。伴随 1947 年印度仓促的分裂，从西部 Baluchistan 席卷到东部的孟加拉，爆发了集体谋杀，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血还没有完全干，随着新的地区界限的确定，身份认同发生了进一步收缩，被 Jinnah 强烈谴责的“狭隘的地方主义”不仅在巴基斯坦也在印度出现了。缅甸正式独立一年后，就转向了内战与分离主义者的战争，以后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都还没完全



走出来；而也在 1948 年独立的锡兰，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敌意用了 8 年才达到了顶点，但当冲突发生时，却极端的野蛮。苏丹——非洲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也走上了缅甸人的道路。在它独立前夕，南部军队的叛变引发了广泛的骚乱，紧接着爆发了分离战争。

每一个这里的事例以及其他这类事例都被看作 *sui generis*\*。当然，每个事例都有它自己的不同，但是每个事例也都说明了一个普遍而强大的趋势：身份随情境而趋向于扩张，这通常由扩张的地区边界所塑造，同样，身份也会随情境收缩而趋向于收缩，这通常又是由收缩的地区边界来界定的<sup>70</sup>。根据定义，自我决定使收缩的情境非常重要。自我决定因此提出了“自我”的问题——它只决定了很少的东西。

同化和分化的动力是一种意识，即关于同自己共享空间的他人的相似与差异的认识。随着既定政治单位的重要性逐渐增长，在这个政治单位层面以下最高级别的有效身份认同层面的重要性也会立即增长，因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作出相似性的判断并作出比较的。看来好象有一种“帕金森定律”在起作用，根据这一定律群体身份趋向扩张或收缩以填补能表达身份的政治空间。

## 结论

在民族边界变化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疑问，正像现在呈现的这样，甚至还没有初步的解答。不仅群体借以判断彼此间相似与不似的标准的形成是一个完全未被探索的领域，而且甚至在混合与包含或分裂与衍生之间的这种基本区分也还有很多疑问。

例如，有人认为混合与分裂可能是比包含和衍生更“机械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几乎被坚定拥护的特定的集体目标，如经济上或声望上的成就，这在包含与衍生中通常似乎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混合和分裂可能更依赖于纯粹外在的环境，如政治边界在范围与含义上的突然转变。有趣的是包含与衍生一旦完成，常常会涉及到放弃以前的身份的问题——可能因为出于工具性的考虑<sup>71</sup>——而混合和分裂则倾向于涉及到身份增多，而不只是一个身份换为另一种身份的问题。<sup>72</sup>这可以让以后的过程更为灵活，即随新的情境冲击着人们的认识时，会有潜在的向上或向下的修正。至少，这是一个似乎正确的假设。

同样未确定的是在特定过程中的变异的决定因素。为什么 Baganda 人会修正他们的习俗以包含比他们声望低的移民而成为 Buganda 人呢？而在 Uganda 西部正在进行的类似的过程中止了，不是由有威望的所包含群体 Batoro 人，而是 Bakonjo 人一直积极地抛弃他们的传统、习俗（包括割礼）、语言以支持 Batoro 人典范。<sup>73</sup>是什么变量会决定 Chamialis 人是否继续接受 Brahmanuris 的 Brahmans 人身份，或 Brahmans 人是否会继续他们相对来说最近出现的向 Chamiali 人身份靠拢的倾向性。这里有三个不完全包含的事例，并没有对包含的“效果”中出现分裂作出明显的解释。

考虑到以上这些我们理解中基本的不足，在民族分裂的社会中随着一些更重大的政策问题会出现身份的改变，针对这种身份改变所作的研究会有线索可能是比较奇怪的。我将简略——并广泛的——触及到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不同程度上混合的一般效果是把新层次的身份加于旧的身份上，而并不取代后者。只是它很少或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混合才会成功地产生彻底的融合以消除组成它的次群体之间的差别。在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人和印度族群内存在的多样性遭到了毁灭的破坏，这造成了人类的重大损失，而且这种破坏可能只是因为这些族群还处于奴隶制或以后的半奴

\* *sui generis*: 法语，意为“特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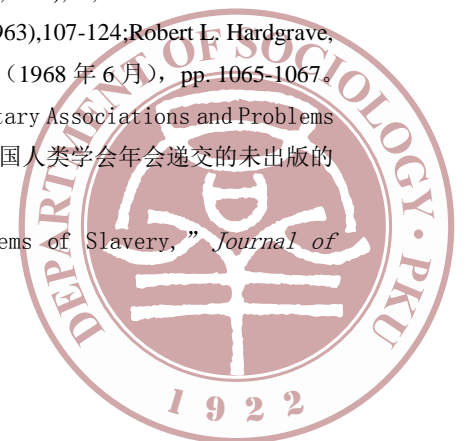
隶制社会。今天很少有国家能对所属群体再产生使西印度的融合成为可能的那种程度的从属、胁迫和压力了，也很少有国家能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吸引力的方法。西印度经历的野蛮暴行表明了在任何一个新老国家推行同化主义政策，或更精确地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混合主义政策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当前的政治边界内，如果融合是目标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满足于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够彻底的结果。

第二，至少，对脱离主义或分裂主义者面对民族冲突的解决办法也会产生同样的疑问。如果通过把一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国家来实现消除民族多样性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面对民族身份的情境化特点。当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更大实体的一部分时，看起来是同质的，而如果它通过努力独立出来后，在还有亚群体存留的情况下，就不太可能还保持那样的同质。针对重要政治边界向下的转变，大多数群体成员都是通过以群体身份为中心作出向下的转变来回应的，而且，可能发生的事是，地区上的脱离与分割将会导致群体边界的收缩，但它们对于减少民族的多样性却不是必需的。

第三，存在相反的选择：经过“国际间地区整合”或联盟来扩张政治边界。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时，这应该会对混合产生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可以想见，有技巧地增加各种政治边界的层面可能也会增加在民族识别上有意义的层次，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层面的身份太过显著而造成不可控制的冲突。基本上这是通过分派冲突而达到控制冲突的观念。我不知道欧洲是否能够拯救比利时。但是从群体边界随政治边界而扩张与收缩来看，这似乎是很清楚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要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地区边界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建议在现在非常不合时宜——简直是太不合时宜了，因为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继续反对早期过分的形式主义。无论如何，民族身份的情境性特征暗示，很难忽略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过程之间的那种强大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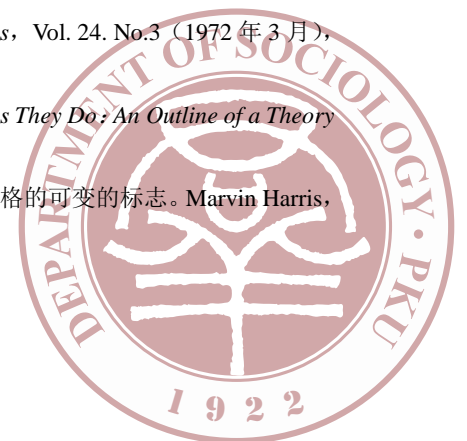
**注释：**我要感谢 Martin Doornbos 对这篇论文的评论。

1. “Changing Patterns of Multiethnic Interaction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美国人类学会年会所递交的未出版的论文，1971年11月20日。以下所做描述从这篇论文中摘录。随后的解释由我负责。
2. 例如在乌干达一些类似的趋势，参看 May Edel, “African Tribalism: Some Reflections on Ugand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0.3(1965年9月), pp. 367-370。
3. Immanuel Wallerste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1.3 (1960年6月), p. 131。
4. 例如，一个群体如果失去它内部的内聚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分裂为它的各组成部分。如果它一直在成员资格的判准方面变得更少先赋性，它很可能相当大地扩展了它的边界也扩大了它的数量。
5. 参看 Erich Rosenthal, “Acculturation without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3(1960年11月), pp. 275-288。我在下面讨论文化改变和身份改变中的一些关系。
6. David G. Mandelbaum, *Society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II, 488。
7. F. G. Bailey, “Clos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963), 107-124; Robert L. Hardgrave, “Caste: Fission and Fus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Bombay), 专刊号 (1968年6月), pp. 1065-1067。
8. Mandelbaum, *Society in India*, II, pp. 496-499; 参看 Mahadev L. Apt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Problems of Fusion and Fission in a Minority Community in South India,” 美国人类学会年会递交的未出版的论文，1972年11月，p. 5。
9. Donald L. Horowitz, “Color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merican Systems of Slavery,” *Journal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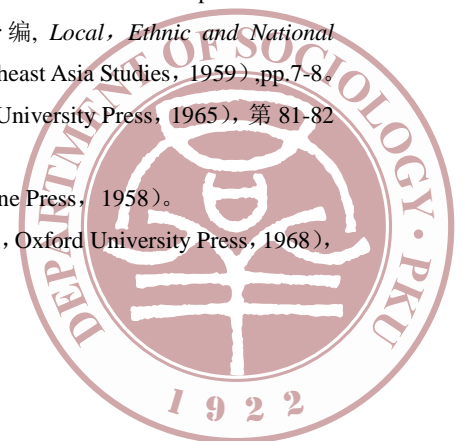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3(1973年冬季卷), pp. 509-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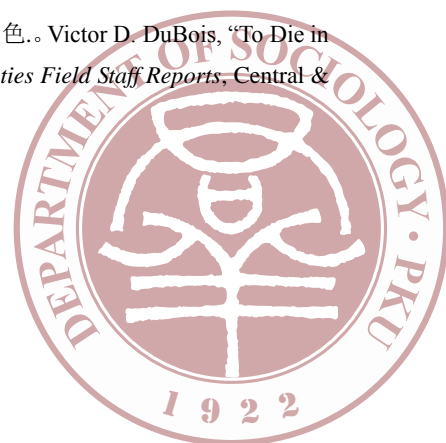
10. 不同于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
11. 与在 Jura 地区的瑞士人中一个“Jurassien”人身份的出现相比较, 都讲法语和信奉罗马天主教。Manfred W. Wenn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rn Separatist Movements: Examples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递交的未出版的论文, 9月2-6日, 1969。关于南斯拉夫穆斯林身份与审查分类和官方政策的关系, 参看 *New York Times*, 5月8日, 1974, p.2。
12. 参看 I. M. Lewis, “Integration in the Somali Republic,” 载于 Arthur Hazelwood 所编,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51-284。
13. B. H. Farmer, *Ceylon: A Divided 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6, p.31。
14. Elizabeth Colson, “The Assimilation of Aliens among Zambian Tonga,” 载于 Ronald Cohen and John Middleton 所编,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n: Studies in Incorporation Processes* (Scranton, Chandler 出版公司, 1970), p.39, pp.51-52; Edel, “African Tribalism,” p.369; 参看 A. I. Richard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Immigrants,” 载于 Richards 所编,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ibal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W. Heffer & Son, 1954), pp.161-188。
15. Baldev Raj Nayar, *Minority Politics in the Punjab*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 57-74 页。
16. P.H.Gulliver, Introduction to Gulliver 编,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in East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22。
17. “原生的”这个词主要受由 Martin R. Doornbos,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Concerning Ethnicity in Integration Analysis,” *Civilisations*, 22.2(1972), pp. 268-283。也可参看他的有关新的类属的评论, “Bantu”和“Nilotic”, 乌干达, 同上, p.281。
18. 身份的这些层次在由 Charles W. Anderson, Fred R. von der Mehden 和 Crawford Young 写的 *Issu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7) 第三章中有深入的探讨。关于一个在非洲的潜在身份单位的调查, 参看 Elliott P. Skinner, “Processes of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in Mossi Society,” Cohen 和 Middleton 所编, *From Tribe to Nation*, pp.177-180。
19. 参看 Otto Klineberg 和 Marisa Zavalloni, *Nationalism and Tribalism among African Students: A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The Hague, Mouton, 1969), pp.177-180。
20. Michael C. Hudson, *The Precarious Republic: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Leban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 21。
21. 关于功能自治, 参看 K. B. Madsen, *Theories of Motivation*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 121-122 页。参看 Muzafer Sherif 和 Carl I. Hovland, *Social Judgment: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78。也看看 Henry Teuue, “The Learning of Integrative Habits,” Philip E. Jacob 和 James V. Toscano 编,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964), pp. 247-282。
22. 参看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3 (1972年3月), 第 340 页。
23. 关于在描述组织的边界中身份标志的使用, 参看 *Why Organizations Behave as They Do: An Outline of a The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61), 第 40 页。
24. 参看, 例如, 对于在 Andean America 的“印第安人”和“ladinos”群体成员资格的可变的标志。Marvin Harris, *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Walker & Co., 1964), pp.38-39。



25.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1954)。
26. Henri Tajfel, "Perception: Social Perception," David Sills 编,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XI, 第 570 页。关于这样的效率的事例, 参看 Donald L. Horowitz, "The Dimensions of Ethn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3.2 (1971 年 2 月), pp. 240-244。
27. 参看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ty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4 (1965 年 10 月), p. 1225。
28. 因此, 这个讨论没有涉及到 William H. Rikers 所描述的那类特意的、工具的、通常是暂时的合并,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或者参看 Lloyd I. Rudolph 和 Susanne H. Rudolph,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第 98-101 页, 那些使用“融合”与“分裂”的词语用于短期联盟的人没有必要被认为是先赋的。
29. 关于这个主题最彻底的处理, 参看 Sherif 和 Hovland, *Social Judgment*。一个批评性的最新的摘要收录在 Charles A. Kiesler, Barry E. Collins 和 Norman Miller, *Attitude Chan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69), 第 6 章。
30. 也许应该加上实验室, 似乎比起社会认知领域更不适于族群界限的判断, 在那些领域任意群体的反应都被检验。
31. Sherif 和 Hovland, *Social Judgment*, pp. 74-75。
32. 同上, pp. 86-87。
33. 参看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to Barth 编,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14, p. 18, pp. 2-33; Doornbos,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Concerning Ethnicity," p. 279。
34. Burton Bebedict, *Mautritius: The Problems of a Plural Societ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5), pp. 38-39。
35. "Social Change and Validity of Regional Stereotypes in East Pakistan," *Sociometry*, 24.4(Dec. 1966), pp.436-437。
36. *Malay Peasant Society in Jelebu*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5), 第 134 页。关于 Negri Sembilan 马来亚人把大多数的标准带回到他们的村庄, 参看同上第 96-98 页。
37. P. C. Lloyd, "The Ethnic Background to the Nigerian Crisis," S. K. Panter-Brick 编, *Nigerian Politics and Military Rule: Prelude to the Civil Wa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0), 第 12 页。
38. 另一个文化综合的例子, 参看 Abner Cohen,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to Yoruba Towns* (London: Routledge, 1969), 第 159 页。
39. 参看 Anderson, von der Mehden 和 Young, *Issu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第 2 章。也可参看 Crawford Young, *Politics in the Cong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 11 章; John N. Paden, "Urban Pluralism,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Communal Identity in Kano, Nigeria," Cohen 和 Middleton 编, *From Tribe to Nation*, pp.245-246; Immanuel Wallerstein,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Hilda Kuper 编,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 156。
40. G. Williams Skinner, "The Nature of Loyalties in Rural Indonesia", Skinner 编,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59), pp.7-8。
41. Michael F. Lofchie, *Zanzibar: Background to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 81-82 页。
42. J. M. Gullick,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43. 关于中国人的分裂, 参看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rn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p. 269-273。
44. 因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关于马来西亚政治的一般研究中被证实。然而，马来人人内部和中国人内部的分裂依然存在着一些力量。关于中国人，参看同上。关于马来人，参看 Swift, *Malay Peasant Society in Jelebu*, p.22, p. 88; Peter J. Wilson, *A Malay Village and Malaysia*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7), pp. 18-24。
  45. 参看 Charles Leslie, *A New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J.Hodges,1740), pp.310-311。比较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 111, p. 185。
  46. 参看，举例来说，Edward Jenkins, *The Coolie: His Rights and Wrongs* (New York,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71)。
  47. 参看 George Delf, *Asians in East Afric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8. Chandra Jayawardena, *Conflict and Solidarity in a Guianese Plant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8), p. 23。还可参看 Morton Klass, *East Indians in Trinidad: A Study of Cultural Pers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56, pp. 178-179。
  49. Frank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8), p. 247。
  50. 同上, p. 139。
  51. Politics in the Congo, pp. 242-245, pp. 247-249。
  52. Sherif 和 Hovland, *Social Judgment*, pp. 89-90。
  53. 关于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系统的例子，参看 Horowitz, “Color Differentiation。”
  54. Elliott P. Skinner, “Strangers in West African Societies,” *Africa*, 33.4 (October 1963), p. 315。
  55. 参看 A.F.A. Husain and A. Farouk,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Khulna* (Dacca,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Dacca, 1963)。
  56. Edward Bruner,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in Indonesia,” 东南亚发展咨询团体 1972 年未出版论文, p.21。还可参看 Young, *Politics in the Congo*, pp. 240-241。
  57. Bailey, “Clos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121-122: Mandellbaum, *Society in India*, II, Chapter 26。
  58. Howard Wolpe, “Port Harcourt: Ibo Politics in Microco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7.3 (September 1969), 486。
  59. Schuman, “Social Change and the Validity of Regional Stereotypes,” pp. 429-430。
  60. Colson, “The Assimilation of Aliens Among Zambian Tonga,” p.37。
  61. 参看 R. S. Miln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100。
  62. Young, *Politics in the Congo*, pp.245-246。
  63. Schuman, “Social Change and the Validity of Regional Stereotypes,” pp. 429-430。
  64. 内战后，被任命管理以前分立的各州的联邦政府官员被谴责为偏向他自己所属的“亚群体”，the Onitsha Ibo. *Washington Post*, Nov. 30, 1970, p. A-20。
  65. 举一个可怕的例子，参看在 Burundi 的南部 Hutu 人的残杀中南部 Tutsi 人的角色。Victor D. DuBois, “To Die in Burundi-Part I: The Eruption of Intertribal Strife: Spring 1972,”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s, Central & Southern Africa Series*, 16.3 (September 1972), 4-5。
  66. Hugh Tinker,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10-12。
  67. Nayar, *Minority Politics in the Punjab*, pp. 62-63, 71-73。
  68. 引自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15, 1969, P. 375。





69. 应该很清楚在殖民统治的高压下肯定有种族歧视和暴力，但是在向非殖民化所迈出的一小步以后将会更多这样的种族歧视与暴力。
70. 和位置一样，正是地区界限的意义影响了不同层面的身份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外在情境甚至在殖民者离开后还依旧重要。例如，在索马里，独立后的最初几年的标志是作为索马里人试着寻找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兄弟的那种民族统一主义。甚至在这期间，索马里政治严重受到互相争斗的先赋群体利益的影响，但是一个外部的关系缓和的政策确实导致了内部分裂。1969年不稳定的种族平衡在一次以暴力为标志的选举中被破坏，下界总统被谋杀和政变推动了超级军事议会的到来，议会是被仔细的被选择出来以重建族群的平衡。参看 E.A. Bayne, "Somalia's Myths Are Tested,"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s, Northeast Africa Series*, 16.1 (1969)。
71. 例如，参看 Barth, "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 Barth 编,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p. 124-125. 当然，工具性的计算并不必要总是被排除在混合和分裂外。参看注释 6-8 和上面的相关内容。
72. 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 Herbert Kaufman 提出三个层面的而非两个层面的组织边界扩展的类型学，通过把混合分为合并和联邦；在后者“参加的组织保留他们自己的身份和边界，但是通过协议建立另一个组织，它的边界涵盖了所有的群体。” *Why Organizations Behave as They Do*, p. 55。
73. Martin R. Doornbos, "Kumanyana and Rwenzururu: Two Responses to Ethnic Inequality," Robert I. Rotberg and Ali A. Mazrui 编,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Doornbos, "Protest Movements in Western Uganda: Some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Kroniek van Afrika* (1970/3), pp. 213-229. 应该说大多数卷入了竞争和以后对 Batoro 风俗拒斥的 Bakonjo 人都是富有抱负的精英成员。这并不奇怪，因为合并运动经常先在精英层面开始出现。

---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于长江

电子邮件：[chjyu@sina.com](mailto:chjyu@sina.com)

